

農家老人社會網絡關係初探

鄭淑子 林如萍* 高淑貴**

實踐大學生活應用科學學系副教授

*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家政教育系副教授

** 國立台灣大學農業推廣學系教授

摘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目前農家老人的社會網絡關係，分別由農家老人的社會網絡範圍與組成及社會網絡連繫特質加以探討。並由傳統文化、規範背景，解析形成農家老人社會網絡關係的相關因素。研究以三角測量法進行，採量化的社會調查法及質化的深入訪談法。本研究以農家老人為研究對象，由全省北、中、南、東地區的十六個鄉鎮選出320人，進行問卷訪問，實得有效問卷306份；另一方面，就受訪老人中取出十五位進行深入訪談。

研究結果發現，受訪者的社會網絡範圍組成中，親屬比例高達0.9307，而鄰居比例及朋友比例皆極低。農家老人目前是在就業者、子女數較多者，其社會網絡較大。社會網絡組成的關係類型中，以兒子的比例最高。受訪者與形成網絡的成員感到「非常親近」、「親近」者達四分之三；與網絡成員的「見面頻率」、「電話頻率」皆以「幾乎每天」為最多，其網絡成員中有三分之二與受訪者住在同鄉鎮內，農家老人與網絡成員形成強連繫。

關鍵字：農家老人；社會網絡

壹、緒論

臺灣地區65歲以上人口佔全國總人口的比率，從民國54年的2.65%，增加到民國85年的7.86%(內政部，1997)，三十年之間增加了將近兩倍。在農村，由於青壯人口的外移，人口老化的現象較都市地區更為嚴重。依據民國八十六年台灣地區農業基本調查，農戶中65歲以上的高齡人口，佔總農戶人口的15.06%(台灣省農林廳，

1998)。由於老年人口不斷的增多，農村社會將面臨一個新的考驗。

Kahn & Antonucci (1980) 的護衛模式(convoy model)概念，將網絡成員視為個人的護衛。老人可由網絡成員中取得生活所需資源，面臨危機時，網絡成員亦可提供所需協助。Wellman(1988)認為個人是生活在網絡的世界，日常生活中各種支持行動提供者的集合，便成為個人的支持體系，個人之日常生活與社會支持、社會網絡息息相關。社會網絡關係是社會支持交換作用之情境及背景(setting)，社會網絡的概念越來越被重視，顯示研究者企圖去了解老人在複雜且不同的情境下，如何建立以及達成這些特定的社會關係(Snow & Gordon, 1980)。

近年來國外探討老人社會網絡、社會支持之研究為數頗多(Marsden, 1992; Penning, 1990; Wellman & Wortley, 1990)，但因家庭結構及文化規範之差異，東西方之研究結果並不一致。國外的研究指出，配偶以及成年女兒是老人最主要的支持來源。而中國社會是由父系單系親屬原則所組成的親屬關係體系(費孝通, 1949)，不僅家族的身分和財產的繼承都是由兒子繼承，連奉養父母的責任也都是由兒子來承擔。社會上大多數人對晚年生活也大都希望依賴兒子，希望依賴女兒者比例甚低(Tsui, 1987)。高淑貴、黃璉華(1992)的「農村老人生活狀況與福利需求」研究也顯示，農村老人經濟的主要來源為兒子、媳婦，生病時的主要照顧者亦為兒子、媳婦。因此，研究中加入「父系」及「文化」等規範因素之探討，顯得具有意義的。

綜合上述本研究的目的為：瞭解目前農家老人的社會網絡關係，分別由農家老人的社會網絡範圍與組成及社會網絡連繫特質加以探討。並由傳統文化、規範背景，解析形成農家老人社會網絡關係的相關因素。

貳、文獻探討

一、社會網絡關係的理論基礎

(一) 活動理論

活動理論主張，老人在社會中必須積極尋求徹底的整合和參與。為了達到此目標，老人必須發展組織性的結構和情境以進行互動，透過互動創造出新的社會角色。而老人新的社會角色和社會發展，都有賴於老人自己的活動參與。活動可導致社會參與，社會參與可形成網絡，藉由社會網絡可取得社會支持，而能提高老人生活品質(Lemon, 1972)。

(二) 社會資源理論

社會資源理論對資源的定義採較為廣義，凡被社會規範系統所認定其有價值的財貨皆可視為一種資源。Lin(1982)將社會資源視為鑲嵌在個人社會網絡的資源，這些資源並非個人所擁有的財貨，而是指個人透過其直接或間接的連繫所能取得的資源。Lin(1986)提出三種假設：

(1) 位置強度假設(strength of position hypothesis)

Lin(1986)預設了一種金字塔型的結構特質，其上下階層的位置主要是依據對這些資源的取得與控制程度而定，一個人的位置越靠近結構的頂端，他所能取得與控制的資源就越多。

(2) 連繫強度假設(strength of ties hypothesis)

連繫強度假設是指弱連繫比強連繫更能引導人們取得較好的社會資源(Lin, 1986; Podolny & Baron, 1997)。個人如能突破其親密的社會圈，就更有可能接觸到社會層級結構中較高地位的社會人士，亦能在資源所鑲嵌的層級結構中得到較好的社會資源(Lin, 1986)。

(3) 社會資源假設 (social resources hypothesis)

社會資源假設主張，從事工具性行動時，無可避免地要取得行動者所缺少的資源，為了達成目標，較好的策略就是接近社會層級結構中居較高位置的社會連繫(Lin, 1982)。

(三) 社會交換理論

社會交換理論指出人際間互動行為的內涵往往受參與互動雙方角色，以及互動過程的規範，如交換性、合理性、公平性等的影響，而這些角色、規範會影響個人對他人所提供的支持性行為的評價。

交換行為的產生肇因於對某些報酬的取得，這些報酬可以是具體性的或非具體性的。老人本身的內在條件就是老人可以直接作為互動過程中交換的具體資源。非具體性的間接交換資源便是社會規範，即在特定關係中應有的角色行為表現，此為根據社會文化的期望而來的，賦予某一群人享有社會文化「權利」資源，而與其互動的個體便需付出「義務」的成本(Ridley & Avery, 1979)。最明顯的是親屬關係，親屬一直被認為是個人社會支持交換與社會網絡關係的重要行動者(Adams, 1980)；特別是老年父母與成年子女的關係，此一社會規範便是「敬老文化」及「孝道」。

二、社會網絡關係的意義：

Mitchell(1969)認為社會網絡是由一群人所形成某種特定之結合，而且在連結形成網絡的過程中，可用來解釋這群人所涉及之社會行為。社會網絡研究所分析的對象超越了受訪者個人，而延伸到人跟人之間的關係或連繫。以連繫或網絡為單位的

分析，既能顧及個人背景，更能進一步將個人行動或特色納入社會結構的層面上來理解，或探討形成連繫的結構背景（傅仰止，1999）。

社會網絡的連結關係來源很多，有血緣、地緣、情感、興趣、利益、歷史、文化等。不同來源所形成之社會連結，彼此間並非是個有結構的團體，份子間彼此可能有連繫，亦可能素昧平生。而社會網絡的主要成員是親屬、朋友、鄰居、同事，分別代表著不同的社會連結關係與連結基礎。親屬是血緣或姻緣，鄰居是地緣，朋友是興趣或情感的結合，同事則是利益或工具的結合（Bian，1997）。網絡的關係組成亦代表不同的資源類型，網絡中親屬比例愈高，網絡密度會愈大，年齡、教育、性別異質性亦會增大(Marsden，1987)。

個人的社會階層及生命循環階段的位置，會影響個人建構社會網絡關係的大小及網絡特性。網絡結構本身就代表著不同的機會與限制，就社會資源的觀點而言，尋求親屬做為支持者往往是本身資源較為缺乏，較沒有機會與非親屬建立人際關係(Lin，1986)。

三、社會網絡關係的特性：

人際間社會互動的頻率和深度與個人社會特性的相似性有關。Lazarsfeld & Merton(1964)稱此為同質性原則(homophily principle)，用以描述規範性和情感性(normative and expressive)的互動模式，人們會傾向和自己特性較相近的人往來互動(Marsden,1992)。Laumann(1966)亦提出像我原則(like me principle)來說明此互動特性，互動頻繁且關係密切的互動模式，較可能發生在彼此分享相似特質的人們之間。此外，聲望原則(prestige principle)也被用以說明規範性互動的特徵，人們傾向於與有高聲望地位者作為互動的對象。同質性和聲望原則皆指出，人們傾向於和自己有相似特質的人，或在社會結構中居高地位者互動。因此，關係(relationship)是社會網絡的基本概念(Lin，1986)，Wellman & Wortley(1990)及Marsden & Campbell(1984)由人際連繫的強度來描述此現象。

O'Reilly(1988)認為社會網絡的組成可分為結構性及互動性(interactive)兩個構面。結構性構面測量包含關係、網絡人員數目、密度、居住接近(proximity)等；而互動性構面包含持久性(durability，指認識的年限)、接觸的頻率、關係的強度(intensity of relationship)等指標。上述指標中以網絡人員數目為最重要，其次為接觸的頻率(O'Reilly，1988)。Wellman & Wortley(1990)使用關係的(relational)、結構的(structural)及個人的(personal)特質等三個層面去分析社會網絡關係。關係面包含了連繫強度及二者接近的可能性；結構面(源自社會學的核心信念，認為集體現象會影響個人行為，團體成員間的溝通、合作、控制力會影響支持資源的流向)包含互動密度及親屬組成，網絡成員互動密度大，代表支持網絡的凝聚力強，有如支持群

體；網絡親屬比例的多寡代表親屬規範義務觀的強弱感。個人特質面包括網絡成員的位置資源(positional resources)，解釋網絡成員所擁有的特質及資源，及相似性和相異性(similarity and dissimilarity)解釋位置及關係的組成。

大多數的研究將社會網絡關係分爲(1)結構上組成要素即網絡範圍與組成、(2)實質上之互動或連結要素即網絡連繫特質兩個構面來說明(O'Reilly, 1988; Marsden, 1987; Antonucci & Akiyama, 1987; Burt, 1984; Snow & Gordon, 1980)。本研究將由結構性面向網絡範圍與組成的網絡大小、親屬比例、鄰居比例、朋友比例等要素，以及互動性構面網絡連繫特質的關係類型、連繫強度(親近性、電話頻率、見面頻率)、居住地等構面來探討社會網絡關係。

參、研究方法與設計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農家老人的社會網絡關係，研究方法採三角測量法(triangulation)，即採量化研究的社會調查法，及質化的深入訪談法。先採社會調查法，請受訪老人列出過去一年來，在生活中感到最親近、最重要的人，最多填寫十人。研究者以問卷方式，蒐集其網絡成員的基本特質及互動、連繫特質。據此分析農家老人的社會網絡關係。另一方面，就受訪老人中抽取十五位進行深入訪談。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農家老人爲研究對象，由全省北、中、南、東地區各抽選出三至四個鄉鎮，由各該鄉鎮區農、漁會家政推廣人員協助，依本研究立意取樣標準，選擇在其所轄地區內的農、漁村老人20人進行訪談。研究對象由全省十六個鄉鎮區，選出320人，進行問卷訪問。本研究立意取樣的標準爲：(1)居住在農、漁村地區，(2)家庭從事農、漁業，(3)年齡在六十五歲(含)以上，(4)育有子女且有成年子女。

訪問調查工作自民國八十六年四月初開始至同年五月中旬截止，歷時約一個半月。總計回收問卷315份，回收率爲98.4%，其中回答不完整的廢卷9份，有效問卷爲306份。

受訪農家老人的特性爲：男性47.7%、女性52.3%；年齡以七十歲左右爲最多，教育程度以小學及小學以下爲多數近九成。婚姻狀況爲有偶者69.6%，喪偶者29.7%；健康狀況以普通爲多數。受訪者有四成目前仍在工作，個人主要經濟來源以現在所得最多佔34.3%，其次爲兒子、媳婦供給者佔33.7%；並且，大多數受訪者表示生活費足夠。居住安排以固定與一已婚兒子同住爲最多數，有68.6%。受訪農家老

人的平均子女數為5.09人。

三、重要變項之操作定義

1. 網絡大小

指網絡成員中的數目，特別強調親近者、或重要者的人數。受訪老人與一位網絡成員，形成一組社會連繫。

2. 親屬比例、鄰居比例、朋友比例

親屬比例指網絡成員中親屬關係所佔的百分比，0 %表示網絡中全無親屬者，100 %表示網絡成員中全部由親屬所組成。鄰居、朋友比例之採計方式與親屬比例相同。

3. 關係類型

指受訪老人與形成社會連繫者之關係為何。關係類型有配偶、兒子、女兒、媳婦、女婿、兄弟姊妹、其他親戚、鄰居、朋友等。

4. 連繫強度

本研究連繫強度是採用Marsden & Campbell(1984)之架構，由親近性(closeness)、見面頻率、電話頻率等多重指標所組成。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社會網絡範圍與組成分析

本研究請受訪者列出過去一年來，在生活中感到最親近、最重要的人，至多填寫十人，即一位老人至多有十組社會連繫。每位受訪者根據他們主觀認定，選擇他們最親近、重要，較能從中獲得助益者成為他們社會網絡成員。

受訪者在形成社會連繫中所列的人數，分別為1人到10人不等。由表一得知，受訪者的網絡大小以10人者為最多，佔26.6%，其次為5人有14.1%，再次為3人有13.7%。網絡大小僅1人者有4人，佔1.3%。網絡大小以10人為上限，其平均值為6.31，標準差為2.79。

親屬比例以1.00為最多，佔76.5%，其次為0.67-0.99有17.0%，親屬比例0者僅4人佔1.3%。親屬比例之平均數為0.9307，標準差為0.1521。美國GSS調查的親屬比例為0.55 (Marsden, 1987)，熊瑞梅(1991)在台中縣、市的研究，親屬比例為0.56。鄰居比例以0為最多，佔84.0%，其次為0.01-0.33有14.0%；鄰居比例之平均數為0.033，標準差為0.089。朋友比例以0為最多，佔86.9%，其次為0.01-0.33有9.8%；朋友比例之平均數為0.036，標準差為0.1121。受訪者的社會網絡中鄰居比例及朋友

表一 網絡範圍與組成基本描述分析

變項名稱	次數	百分比	平均數	標準差
網絡大小			6.31	2.79
1人	4	1.3		
2人	17	5.6		
3人	42	13.7		
4人	31	10.1		
5人	43	14.1		
6人	35	11.4		
7人	26	8.5		
8人	17	5.6		
9人	10	3.3		
10人	81	26.6		
合計	306	100.0		
親屬比例			0.9307	0.1521
0.01-0.33	4	1.3		
0.34-0.66	16	5.2		
0.67-0.99	52	17.0		
1.00	234	76.5		
合計	306	100.0		
鄰居比例			0.033	0.089
0	257	84.0		
0.01-0.33	43	14.1		
0.34-0.66	6	2.0		
合計	306	100.0		
朋友比例			0.036	0.1121
0	266	86.9		
0.01-0.33	30	9.8		
0.34-0.66	8	2.6		
0.67-0.99	2	0.7		
合計	306	100.0		

比例皆極低。

由受訪老人的個人特質、情境特質與社會網絡範圍與組成之差異分析(表二)中得知，只有就業情形、經濟狀況滿意程度、婚姻狀況、健康狀況、居住安排型態有差異存在。

就業情形與網絡大小有顯著的差異存在，目前「是」在就業者，其網絡大小的平均人數大於「未」就業者。就業情形與親屬比例亦有差異存在，目前「是」在就

表二 老人個人特質、情境特質與網絡範圍與組成分析

	網絡大小	親屬比例	鄰居比例	朋友比例
	平均數	平均數	平均數	平均數
性別				
男	6.520	0.916	0.038	0.046
女	6.112	0.944	0.029	0.027
t值	1.261	-1.587	0.934	1.419
年齡				
69歲以下	6.289	0.936	0.032	0.031
70歲以上	6.333	0.925	0.034	0.041
t值	-0.141	0.668	-0.194	-0.752
教育程度				
不識字	6.113	0.950	0.024	0.026
識字未入學	5.892	0.903	0.047	0.049
小學	6.574	0.920	0.036	0.044
初(國)中以上	6.500	0.931	0.041	0.026
F值	0.882	1.222	0.887	0.745
生活費用夠用程度				
不夠	6.300	0.919	0.056	0.025
尚可	6.119	0.936	0.027	0.037
足夠	6.508	0.929	0.032	0.039
F值	0.644	0.202	1.581	0.238
經濟來源				
本身或配偶	6.412	0.932	0.034	0.033
他人	6.171	0.928	0.032	0.040
t值	0.771	0.233	0.199	-0.474
經濟狀況滿意程度				
不滿意	5.720	0.916	0.077	0.067
尚可	6.254	0.933	0.033	0.033
滿意	6.573	0.929	0.021	0.049
F值	1.025	0.144	4.000*	1.598
就業情形				
是	6.929	0.907	0.043	0.049
否	5.878	0.947	0.026	0.027
t值	3.203**	-2.153*	1.608	1.668
婚姻狀況				
有配偶	6.310	0.947	0.030	0.023
喪偶	6.308	0.896	0.037	0.067
t值	0.006	2.445*	-0.681	-2.465*

續表二 老人個人特質、情境特質與網絡範圍與組成分析

	網絡大小	親屬比例	鄰居比例	朋友比例
	平均數	平均數	平均數	平均數
健康狀況				
差	5.579	0.966	0.017	0.017
尚可	6.514	0.930	0.030	0.040
良好	6.611	0.903	0.051	0.046
F值	3.578*	3.604*	3.199*	1.586
居住安排型態				
獨居	6.773	0.803	0.056	0.141
與配偶同住	5.948	0.946	0.038	0.016
其他居住安排	6.938	0.848	0.042	0.110
與子女同住	6.314	0.946	0.029	0.025
F值	0.797	8.184**	0.759	10.990**
子女數				
1-3人	5.632	0.908	0.039	0.053
4-5人	6.293	0.919	0.036	0.044
6人以上	6.635	0.952	0.027	0.020
F值	2.575	2.281	0.482	2.235

*P<0.05 **P<0.01

業者的親屬比例為0.907，低於「未」就業者的0.947。經濟狀況滿意程度與鄰居比例間有差異存在，經濟狀況「不滿意」者鄰居比例最高；而「滿意」者最低。婚姻狀況與親屬比例、朋友比例間有差異存在。親屬比例方面，有配偶者為0.947大於喪偶者的0.896。朋友比例方面，喪偶者為0.067大於有配偶者的0.023。健康狀況與網絡大小、親屬比例、鄰居比例有差異存在。健康狀況「良好」者網絡最大6.611人，其次為「尚可」者6.514人。健康狀況「良好」者其親屬比例最低，「差」者親屬比例最高。健康狀況「良好」者鄰居比例最高，其次為「尚可」者，再次為「差」者。居住安排型態方面，「與配偶同住」及「與子女同住」者之親屬比例最高，「獨居」之親屬比例最低。居住安排型態與朋友比例方面，經F檢定有差異存在；「獨居」之朋友比例最高，其次為「其他居住安排」，「與配偶同住」最低。

表三為受訪者個人特質之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生活費夠用程度、主要經濟來源、經濟狀況滿意程度、就業情形、婚姻狀況、健康狀況，及情境特質

居住安排、子女數為自變項對網絡大小所做的複迴歸分析。自變項的檢定中，以就業情形、子女數等變項對網絡大小有顯著的解釋力。從模式得到的結果，可以預測為目前是在就業者、子女數較多者其社會網絡較大。

表三 個人基本特質、情境特質對網絡大小的複迴歸分析

解釋變項	網絡大小
性別(以男性為基準)	0.0058
年齡(以69歲以下為基準)	0.191
教育程度(以未入學為基準)	0.287
生活費夠用程度	-0.05
經濟來源(以本身或配偶為基準)	0.277
經濟狀況滿意程度	0.179
就業情形(以未就業為基準)	1.097**
婚姻狀況(以喪偶基準)	-0.179
健康狀況	0.327
居住安排(以獨居及配偶同住為基準)	
迴歸係數(與子女居住)	0.149
迴歸係數(與其他居住)	0.694
子女數	0.223*
R ²	0.075*

註1：* p<0.05 ** p<0.01

註2：表內數字為迴歸係數

二、社會網絡連繫特質分析

社會網絡連繫特質是以「過去一年來，對您而言，在您生活中最親近、最重要的人有哪些人？」為主要問題，並詢問形成社會連繫這些人的背景資料，和受訪者往來的情形的網絡連繫特質。

每個受訪者選十人成為親密連繫，受訪者便和這十人產生十種連繫關係，但並非每個人的網絡皆為十人。由表二得知，本研究中列舉1人的有4人，2人的有17人，3人的有42人，4人的有31人，5人的有43人，6人的有35人，7人的有26人，8人的有17人，9人的有10人，10人的有81人，所以產生了1931種連繫關係，平均每人選了6.31人成為社會連繫。為配合電腦資料的處理分析，社會網絡連繫特質的分析單位為將case的資料轉換成以連繫關係為單位的資料。

由表四得知，網絡連繫特質之關係類型在全部的網絡組成的類型中，以兒子的比例最高30.9%，其次為女兒22.3%，再次為媳婦14.11%，依次為配偶9.3%、其他親戚8.4%、朋友4.8%、鄰居4.5%、女婿3.1%、兄弟姊妹最低僅佔2.6%。民法中一夫一妻制的限制，以及三成老人是喪偶者。因此在形成的關係類型的配對中，配偶雖然僅佔9.3%，但配偶的重要性仍是極為明顯的。

在親近性方面，受訪者對形成社會連繫的成員中感到「非常親近」的有40%，「親近」佔35.1%，「有些親近」佔24.9%。就見面頻率而言，受訪老人與網絡成員見面頻率，除去「住在一起」者，以「幾乎每天」為最多達22.3%，其次為「每週1、2次」佔16.9%。受訪者與網絡成員的電話聯絡頻率，除去「住在一起」者，以「幾乎每天」最多，達22.7%，其次為「每週1、2次」佔18.9%。

居住地方面，網絡成員與受訪者「住在一起」最多，達34.6%，其次為「同村里」佔21.1%，再次為「同鄉鎮」佔11.8%。網絡成員中有三分之二是與受訪老人住在同鄉鎮內。

受訪老人的社會網絡關係中，親屬所佔比例極大，親屬比例高達0.9307，而鄰居、朋友的比例皆極低。那一類的人會選擇較大比例的非親屬關係呢？Fischer (1982)發現以高收入、年輕、有工作、較少親戚住附近、有參與社團者；而Marsden (1987)則是以男性、高教育、30-35歲年齡組，居住地區人口較多者選擇較大比例的非親屬。就社會資源理論的觀點而言，農家老人尋求高比例的親屬作為親密連繫，可能是因本身資源較為缺乏，較沒有機會與非親屬建立人際關係(Lin, 1986)。社會資源對人們的工具性行動和情感性行動，提供機會與限制(Lin, 1982; Wellman & Wortley, 1990)。

在農村地區，大多數的農村家庭在村中居住了幾十年或上百年，鄰里間常存在氏族關係。受訪農家老人的鄰居比例極低，可能是因為有些網絡成員為住在鄰近的氏族成員，這些氏族成員會被優先視為親屬關係，而較不會被視為鄰居。

在我國的傳統社會中，人與人的關係依照家族或氏族的結構而定。以家庭為中心，可以向外擴展至家族、宗族而至氏族，像水的波紋一樣，一圈圈地推出去，愈推愈遠一直到超出最大的氏族圈外，便是屬於外人。這種以自我(ego)為參考點，向外圈擴散(愈向外關係愈疏)之類似同心波紋的人際或社會關係網，稱為「差序格局」(費孝通, 1948)。各種不同關係類別的區隔(compartmentalization)，有其重要的社會的與心理的意義——在不同類別的關係中，個人是依不同的人際互動原則而運作。親屬比例的多寡，代表親屬規範義務觀的強弱感(Wellman & Wortley, 1990)。對農家老人而言，親屬關係佔社會關係極為重要的位置，可說是受到傳統「血濃於水」的優勢價值屬性的影響。

受訪老人中，有將近七成是與子女住一起的居住安排，而且子女亦承擔部分的

表四 網絡連繫特質基本描述分析

變項名稱	次數	百分比
關係類型		
配偶	179	9.3
兒子	596	30.9
女兒	430	22.3
媳婦	273	14.1
女婿	60	3.1
兄弟姐妹	51	2.6
其他親戚	162	8.4
鄰居	87	4.5
朋友	93	4.8
合計	1931	100.0
親近性		
非常親近	773	40.0
親近	678	35.1
有些親近	480	24.9
合計	1931	100.0
見面頻率		
住在一起	671	34.7
幾乎每天	408	21.2
每週1、2次	326	16.9
每月1、2次	281	14.6
好幾個月1、2次	206	10.7
幾乎沒有	39	2.0
合計	1931	100.0
電話頻率		
住在一起	671	34.7
幾乎每天	419	21.8
每週1、2次	365	18.9
每月1、2次	222	11.5
好幾個月1、2次	66	3.4
幾乎沒有	188	9.7
合計	1931	100.0
居住地		
住在一起	671	34.6
同村里	407	21.1
同鄉鎮	227	11.8
同縣市	200	10.4
不同縣市	422	21.9
海外	4	0.2
合計	1931	100.0

經濟奉養功能。就客觀事實而言，中國式的反饋準則，在農村社會中，仍相當程度的運作著。中國社會文化中對兩代關係所賦與特有的「反饋模式」，亦即下一代要向上一代負責的奉養準則。反饋模式的基礎為何？我國農民以「養兒防老」來闡釋傳宗接代的嗣系問題(費孝通，1985)。親子關係的反饋模式是中國文化的特點，此模式存在歷史久遠，且有許多維持反饋模式的倫理觀念。儒家所倡的孝道，可說是這種模式的反映，且從潛意識型態上鞏固此模式。

在深入訪談中，受訪者對於老年奉養、養兒防老提出許多豐富的內涵，茲將典型之看法節錄如下：

「養兒本來就是老了能有人侍養、有人照顧，死了才有人“哭山頭”」

「養兒就是老了靠子，有得靠，才不會沒人要。」

「俗語說“人靠咱，咱靠伊”，一代一代靠下去，年老時一定會靠兒子，到自己不能做時，仍要靠兒子，若不靠兒子，那當初就不用生了。因為父靠咱，咱靠伊，如此下去，所以會自己要靠伊(兒子)。」

至於問到對於配偶的看法，則大多數的農村老人皆同意「少年夫妻、老來伴」的看法：

「老伴就是老了有個人能互相照顧、關心陪伴、互相聊天、幫我出主意，有老伴才不會“老孤單”。」

「老伴就是老了有人陪伴，有聊天的對象，兩人有伴，飯吃起來也比較好吃。老伴是有感情的，就是能談心事的，與咱會得吃苦，會同心。」

「老伴過世，沒靠山了，不知道以後的日子要如何。」

在傳統中國人的心目中，各種家人關係都是由緣所命定，尤其是父子關係與夫婦關係。中國人的家族是以父系架構為骨幹或支柱，因而父子關係是家族中最主要的對偶關係(楊國樞，1992；Hsu，1971)。對家族的維持與延續而言，夫妻關係雖不及父子關係重要，但卻是父子關係的先決條件。在一家族中，這兩種關係如能穩定而和諧的存在，則此家族必可穩如泰山。傳統中國人特別強調這兩種關係的命定性，等於在不斷提醒為人父、為人子、為人夫及為人妻者，不管現實關係如何不如意，都不可有離異之心，要停留在原有的關係之中，逆來順受，努力完成逃脫不掉的緣份。透過這樣的方式，這些重要關係才能穩定不移，自己的家族也才可永續不墜。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由社會網絡範圍組成及社會網絡連繫特質，探討農家老人的社會網絡關係。研究結果發現受訪者的親屬比例高達0.9307，顯示農家老人選擇高比例的親屬作為親密連繫。親屬比例的多寡，代表親屬規範義務的強弱感，多少反映了規範義務的可能影響（Wellman & Wortley, 1990；伊慶春，1999）。就社會資源理論的觀點而言，可能是因為本身資源較為缺乏，較沒有機會與非親屬建立人際關係(Lin, 1986)。

根據複迴歸分析結果(表三)得知，農家老人目前是在就業者，其社會網絡較大。耕地與農舍是傳統農村社會的生活與生產的主要工具，傳統的父權有很重要的一部份是奠基於耕地與農舍的所有權及其轉移（楊懋春，1980）。與農家老人的訪談中得知，他們只要有土地，而且身體狀況許可，不論年齡、性別他們大都會繼續從事耕作，不會讓土地任其荒廢的。藉由耕作的活動，可讓老人維持正面的自我形象及高品質的滿足感。活動理論認為，社會活動是個人生活的基礎，對於逐漸老化的個人而言，活動顯得尤其重要。每個人可在社會的互動中找到生活的意義(Lee, 1985；Antonucci, 1990)。

由表四的分析結果得知，社會網絡組成的關係類型中，以兒子的比例最高。而且受訪者對所形成社會連繫的成員感到「非常親近」、「親近」者達四分之三，受訪老人與網絡成員的「見面頻率」、「電話頻率」皆以「幾乎每天」為最多，網絡成員中有三分之二是受訪老人住在同鄉鎮內，農家老人與其網絡成員形成強連繫。年老時依靠兒子的資源符合文化規範的期望，但兒子之重要性遽然遽增，仍值得重視。歐美的老人雖然與子女維持某種程度的親密關係，但子女在老人的社會網絡中所佔比例並不高。他們的網絡中，包含了配偶、子女、其他親屬、朋友等，特別是朋友在他們的社會關係中佔了重要的位置。在關係的維持方面，地理性的接近及頻繁互動的接觸，並不是那麼重要，而是保有「有距離的親密」的傾向（Antonucci, 1990）。與歐美的老人相比較，台灣的農村老人與他們的家人、親屬維持了某種程度的親近性關係，有頻繁的見面頻率、電話頻率的互動性接觸及居住地的接近。

我國傳統社會中「養兒防老」、「多子多孫多福氣」的觀念，藉由高生育率並維持擴大家庭的形式，可能是父母預期較可能獲得生活保障的方式。傳統的農村社會，家庭成員就是家庭經濟的共同參與者，家庭成員的關係網絡密切且多元。農家老人的社會網絡關係中，家人特別是子女佔了很大的比例，而且老人對他們有很高的依存度。就社會資源理論的觀點而言，個人如能突破其親密的社會圈，就較有機會接觸到社會層級結構中較高地位的社會人士，亦能在資源所鑲嵌的層級結構中得到較好的社會資源(Lin, 1986)。農家老人未就業者、喪偶者、健康狀況較差者、子

女數較少者更應多參與組織與活動，以獲取較多的社會資源。

與農家老人的深入訪談中得知，有些老人加入農漁會各種產銷班或家政班，成為班員或幹部。除此，尚有加入老人會、婦女會、槌球會、早見會等，多數的老人對於各種組織班的參與都頗為熱衷。老年人口愈來愈多，將形成一股不可忽視的人力資源，若能輔導農村老人成立並參與互助性的組織，這是極有意義的工作。掌握地緣與血緣關係，輔導農家老人成立互助性組織，使老人互相支持，拓展人際關係，不被社會孤立，排解孤獨寂寞分擔痛苦，分享相互扶持的快樂，亦屬重要的一環。該互助性組織尚可充分運用老人力資源，從事生活環境改善與維護、才藝與文化傳承、銀髮族農園的設立等，對於老人生活之獨立自主及農村社會生活品質的提升都是有所助益的。依據活動理論，老人高度參與社會角色、社會網絡時，身心能獲得最佳的調適。

最後，本研究結果與活動理論、社會資源理論、社會交換理論觀點頗能結合。社會網絡是個人與意義他人所形成的社會連繫，此社會連繫圍繞著個人而形成一網狀結構，網絡成員間進行互動的連繫。社會網絡關係的測量，若能訪問每位網絡成員，則可提供更多互動連繫的訊息。本研究由於人力、財力的限制，僅能針對農家老人訪問，亦即僅由農家老人的觀點探討社會網絡關係。因而建議未來的研究，能進一步訪問每位網絡成員，以獲得更完整的網絡相關訊息。

陸、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份

內政部 (1997)。老人狀況調查報告。行政院內政部編印。

伊慶春 (1999)。核心網絡中的親屬與非親屬。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主辦「台灣社會的個人網絡：第三次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研討會」。

高淑貴、黃璉華 (1992)。農村老人生活狀況與福利需求。臺大農業推廣學系。費孝通 (1948)。鄉土中國。香港：鳳凰出版社。

費孝通 (1985)。結構變動中的老年贍養問題」。喬健編，現代化與中國文化研討會論文集編，頁3-12。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暨社會研究所。

農林廳 (1997)。臺灣地區區農業基本調查農家戶口抽樣調查報告。台灣省政府農林廳編印。

楊國樞 (1992)。父子軸家庭與夫妻軸家庭：運作特徵、變遷方向及適應原則。中國心理衛生協會(台北)主辦「家庭與心理衛生國際研討會」主題演講論文。

楊懋春 (1980)。近代中國農村社會之演變。台北：巨流。

- 熊瑞梅 (1991)。社會資源、社會流動與居住流動。國科會專題研究報告。
- 傅仰止 (1999)。核心網絡中的他人聯繫與同質性。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主辦「台灣社會的個人網絡：第三次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研討會」。

二、英文部份

- Adams, J (1980). Service arrangements preferred by minority elderly : A Cross cultural study. The Gerontologist,3(2),39-57.
- Antonucci, T.C (1990). Social supports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Binstock, R.H & George, L.K(Eds.) Handbook of Aging and Social Science, 3rd edition,205-266.
- Antonucci, T.C,H. Akiyama.(1987). Social networks in adult life and a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of the convoy model. Journal of Gerontology, 42(5), 519-527.
- Bian, Yanjie. (1997) Bringing strong ties back in: Indirect ties, network bridges, and job searches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2(3):366-385.
- Burt, R. S. (1984). Network items and general social survey. Social Networks,6, 293-339.
- Fischer, C. S. (1982). To Dwell Among Friends, Personal Networks in Town and C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su, F. L. K. (1971). A hypothesis of kinship and culture. In F. L. K. Hsu (Eds.), Kinship and Culture. Chicago: Aldine.
- Hsu, F. L. K. (1979). The cultural problem of the culture. Anthropologist, 81:517-532.
- Kahn, R., T. Antonucci. (1980). Convoys over the life course: Attachment roles and social supports. In P. Baltes and O. Brim (Eds.), Life Span Development and Behavior,254-283.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Lee, G. R. (1985).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social networks. In Sauer, W. J. & Coward, R. T (Eds.)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and the Care of the Elderly,21-37. New York: Springier,
- Lemon, B. W., V.L. Bengston. and J.A. Peterson. (1972). An exploration of the activity of aging: Activity type and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in-movers to a retirement community. Journal of Gerontology,27, 511-523.
- Lin N. (1982). Social resources and instrumental action. In P. Marsden and N. Lin (Eds.), Social Structure and Network Analysis. Beverly Hills, CA: Sage.
- Lin N. (1986). Conceptualizing social support. In Nan Lin, Alfred Dean, and Walter

- M. Ensel(Eds.), Social Support, Life Events, and Depression. Academic Press, Inc..
- Marsden, P. V. (1987). Core discussion networks of America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52:122-131.
- Marsden, P. V. (1992). Social network theory. In Edgar F. Borgatta & Marie L. Borgatta (Eds.),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 vol.14: 1887-1894.
- Marsden, P. V.& K. E. Campbell. (1984). Measuring tie strength. Social Forces,63 (2), 482-501.
- Mitchell, J. C. (Eds.) (1969). Social Networks in Urban Situations. Manchester, U. K.: University Press.
- O'Reilly, P. (1988).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social support and social network research Social Science Medicine,26(8), 863-873.
- Penning, M. J. (1990). Receipt of assistance by elderly people: hierarchical selection and task specificity. The Gerontologist, 30, 220-227.
- Podolny, J. M. & J. N. Baron.(1997). Relationship and resources: Social networks and mobility in the workpla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2(3):673-693.
- Ridley, C. A., A. W. Avery. (1979). Social networks influence on the dyadic relationship. In Robert L. Burgess & Ted L. Huston (Eds.), Social Exchange in Developing Relationship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Snow, D., J. Gorden. (1980).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d intervention with the elderly. The Gerontologist,20(4),463-467.
- Tsui, Elaine Yi-lan. (1987). Are Married Daughters Spilled Water?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Population studies center. Women Research Program.
- Wellman, B. (1988) The community question re-evaluated. In Michael Peter Smith (Eds), Power, Community and the City. New Brunswick, N. J.:Transaction.
- Wellman, B.,& Wortley Scot. (1990). Different strokes from different folks: Community ties and social suppor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96(3):558-588.